

# 學術期刊的平台策略

楊健民

---

[提 要] 學術期刊是由具有“使命感”的作者所提供的厚重、深刻和優雅的論文構建起來的對人文學術產生獨立精神價值的學術平台。對期刊平台所可能出現的學術論題進行“預設”，才有捕捉到學術問題的可能性，學術期刊就是對這些“預設”的集成。這個集成以問題導向為中心，以跨學科研究為基點，以專題策劃為抓手，以個性和特色為追求，推進不同學科的交叉和融合。綜合類學術期刊要從“學科綜合”的辦刊模式向“問題綜合”的“集成化”平台策略轉變，不同的學術期刊平台，其“問題綜合”的策略依其人文學術的獨立價值、依據、重心而彰顯個性。要以洞察力、概括力和思辨力來判斷論文的思想力，服膺“內心的召喚”，幫助作者提升學術論文的“完成度”。

[關鍵詞] 學術期刊 學術平台 問題預設 集成能力

[中圖分類號] G3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1824 (2020) 04 - 0110 - 12

---

近年來關於學術期刊如何發展的論述已有很多，觀點紛呈。但無論怎樣變化，終究有一個策略性問題，這一直是我多年來反復思考的問題——“學術期刊的平台策略”。這個問題對於每一位學術期刊主編乃至編輯來說，都是需要認真對待的。

## 一、平台的構築和學術論題的“預設”

從學理意義上說，學術期刊發展的根基在於學者，只有學者才是學術期刊的“衣食父母”，這是毋庸置疑的。什麼是學者？費希特說：“學者是有使命的”。1794 年 5~6 月間，費希特在耶拿大學連續做了五場關於學者使命的演講。在這五篇演講中，費希特提出了“大丈夫的思想方式”和“對崇高和尊嚴的強烈感受”。<sup>①</sup>學術期刊的主編和編輯，同樣是作為學者，同樣具有學者的使命。沒有使命感的學者不會有問題意識，也提不出富有使命擔當的問題；而沒有使命感的編輯，同樣缺乏對學者的“思想方式”以及對“崇高和尊嚴”的強烈的思想意識。

學術期刊作為一種平台，是依靠論文而成立的。“成立”是學術期刊生存的基礎，也是學術生產的基礎。一篇論文之所以優秀，就因為它“成立”，“成立”可以直抵論文的學術層面 and 技術層面。一個好的學者，他都在寫永遠“成立”的學術論文。所以，“尋找”優秀的論文，尋找到那些能夠“成立”並且實現學術期刊平台“成立”的論文，是主編和編輯的使命。所謂優秀的學術論文，按照馬克思在他的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與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裡說的，就是“質料”和

“形式”。這兩個觀念取之於亞里士多德，馬克思借此重新評估了伊壁鳩魯自然哲學的人文價值。根據馬克思這個觀念，在我看來，優秀的學術論文的“成立”除了問題、創新和學理之外，還需要有三個要素：厚重、深刻和優雅。厚重指的是立論堅實；深刻指的是論述紮實，不虛張聲勢，不故弄玄虛；優雅指的是追求論文的“完成度”和盡可能的完美。這是學術期刊平台對一篇優秀論文的起碼要求。

平台是出思想家的，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思想家。

任何年代都需要思想家，只有思想家能夠構築學術和思想高地。學術期刊作為一個重要的平台，是思想家的誕生地。思想家是什麼樣的人呢？他們是一群具有“個人自主活動”<sup>②</sup>的理念人，是研究思想、思維和思考模式並且形成思想體系的人。他們通過“對象化”的“勞動”，以獨特的思想智慧去改變既有的思想和學術觀念，從而對學術史、理念史和思想史產生重要影響。在這個世界上，他們的人數永遠最少，但他們對人類文明的影響永遠最大。國外的比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托馬斯·阿奎那、哥白尼、培根、笛卡爾、牛頓、伏爾泰、康德、黑格爾、叔本華、達爾文、尼采、胡塞爾、羅素、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等，國內的比如老子、孔子、孟子、王充、朱熹、王陽明、顧炎武、龔自珍、魏源，比如嚴復、康有為、梁啟超、陳獨秀、魯迅、胡適、湯用彤、金岳霖、馮友蘭、李澤厚等。

1987年，馮友蘭出版了《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冊，其中有個探討太平天國的重要章節。馮友蘭提出了一個問題：太平天國如果成功了會怎麼樣？這個問題過去許多人都沒有仔細想過，大概都認為如果太平天國成功了，那就是理想主義了。馮友蘭卻認為，如果太平天國成功了，就把中國拖回中世紀。<sup>③</sup>這個結論對於中國史學界產生了極大的震撼。馮友蘭為中國學術界提供了一個啟發，就是近代的許多人物都值得重新探討。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學術界仍然把康有為、梁啟超、嚴復這些人看成改良主義者，認為改良主義沒有出路，註定要失敗。到了90年代初，李澤厚在他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裡討論了嚴復。他認為不只是一定要給嚴復一個重新定位，還要從嚴復思想中引申出一個啟蒙問題，他覺得啟蒙思想對當時的中國一定具有推進作用。應該說，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思想界，引領學術問題和思想革命的，李澤厚是舉足輕重的人物。

思想家的標誌性理念在於對人文學術產生獨立的精神價值，即內在於自己的獨立的價值重心，並且表現出完備的價值依據。他們把人類的良知和學術的使命緊緊聯繫在一起，由此體現出兩大思想特徵：一個是原創，另一個是深度。原創性體現了他們提出思想史、理念史和學術史的重大理論問題，能夠以自己的價值判斷改變既有的思想和學術觀念；深度則表明他們建立了一套嚴整的學術理論體系，能夠以人類的“良知”和學術的“使命”這兩個概念，將不同向度上的現實關切收攝於一種終極眷注。比如歌德，他的一生體驗了最輝煌的德國古典音樂、古典哲學、古典文學，然後以自己真的生活、真的人格、真的自由意志，去追問希臘哲學，去詮釋“道”和“心智”——一種意味着個人精神生活和世界精神客體相通的價值眷注。再比如海德格爾，他的哲學讀起來晦澀難懂，但他那兩句“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sup>④</sup>和“向死而生”<sup>⑤</sup>的名言，對於抵制科學技術所帶來的個性泯滅以及生活的刻板化和碎片化，起到了震聾發聵的作用。海德格爾的哲學是運用了黑格爾式的邏輯演繹，把“此在”的種種非理性體驗都給“澄明”了，他絕對是一舉成為思想家且少年得志的罕見典型。

但並不是所有的學者都能成為這樣的思想家。我們編輯學術刊物，在我們的學術平台上，只能去追求思想力，或者說只能去“預設”一種思想力。學術期刊是知識生產的一個平台，具有使命感的編輯，一定明白這個平台依靠什麼而構築？它要預設什麼？

什麼是“預設”？“預設”就是對於平台的可能性空間的假定，質而言之，是對於平台所可能出

現的學術論題的假設。從哲學意義上說,缺少“預設”,所有經驗材料將處於不察、不穩和不睹的狀態,就像我們不會對熟悉發問,是習慣阻礙了我們的發問和“預設”能力。“預設”就是一種先驗,但絕不是什麼“唯心主義”,因為先驗是對普遍有效的經驗知識的預期的描述,是比經驗知識要求更高的知識。假如沒有這種先驗知識,所有知識的描述就只能是虛無。胡適早就說過非常經典的八個字:“大膽假設,小心求證”。<sup>⑥</sup>在這方面,編輯需要清楚地意識到所面對着的學術論文的水平,以及這些論文對於學術期刊平台所可能產生的作用。這其實是一種能力預設,是一種學術的先驗的“感覺”。這種能力預設要求編輯能夠從既有的題目中捕捉和發現到什麼,得到啟示,從而“預設”到某一個學術問題的其他的可能性。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對於主編乃至編輯的一種能力和執行力的考量。

2019年第4期《中國社會科學》發表了復旦大學賀東航教授的《中國公共政策執行的政治勢能》,是作者對他的《公共政策執行的中國經驗》所提出的中國公共政策“高位推動”<sup>⑦</sup>的一個學術表達,也是對發端於西方公共政策理論的一個具有中國風格的學理性回應。2011年,作者提出“高位推動”這個命題,作為公共政策執行的中國經驗,認為“高位推動”可以防止公共政策在執行中陷入“碎片化”,並且通過層級性治理和多屬性治理,來解決公共政策在央地之間、部門之間的貫徹和落實的問題。經過幾年的思考,作者覺得用“政治勢能”這個概念,將更加有效地揭示某些公共政策執行力為何突然得以在某個時段集中增強的原因及其機制。“政治勢能”概念的表達,是中國特色制度賦予政策執行的內在特徵,可以更好地展現中國公共政策執行者的政治邏輯,也更能體現出學術意義,這是一個具有“思想力”的學術表達。我想,政治勢能作為中國特色制度賦予政策執行的內在特徵,可以展現中國公共政策執行者的政治邏輯和行動邏輯;那麼,它是否也能對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政治邏輯和行動邏輯產生影響——這是在我腦子裡產生的一種“預設”。當然,這種“預設”是否就能得到作者的認同,還需要跟作者進行有效的溝通。於是,我約請賀東航為《東南學術》撰寫一篇有關“政治勢能”的文章,並為他擬定《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政治勢能》的題目。賀東航認為這個題目很好,並很快依約寫好文章。此文刊發在《東南學術》2019年第6期頭條。

學術平台的成立是依靠學術論文支撐的,它的一個重要因素就在於需要有一個合理的合乎學術邏輯的支撐點,這個支撐點必須依靠主編或編輯對於學術“思想力”的“預設”。但不是所有文章都是可以如此“預設”的,在日常的工作中,編輯在既有的來稿中還能發現和挖掘更多的“題目”,這同樣是一種“預設”。

2018年,我在一家學術期刊讀到廈門大學楊春時教授的論文《空間解釋學論綱》。楊春時告訴我,他近年來對當代解釋學和現象學問題有了一些新的思考,並且有了新的學術積累。這對我來說無疑是個極好的消息。解釋學作為一門解釋和了解文本的哲學技術,狹義的可以分為一般解釋學、局部解釋學、哲學解釋學等,而廣義的解釋學則可以延伸到對於眾多文本意義的理解和解釋,延伸到其他的學術概念,比如楊春時提出的空間解釋學。在和楊春時交流時我們發現,除了空間解釋學,還有一個重要的命題:文化解釋學。既然可以談空間,文化就在空間裡;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學科的交流、滲透和融合,必定需要有涉及文化主體的人文主義解釋學理論,而且文化解釋學肯定比空間解釋學成熟,也更接地氣,可以對解釋學的文本解釋條件進行深刻的反思。這就是我向楊春時“預設”的一個學術命題。他接受了我的“預設”,經過一段時間的深入思考和研究,2019年初,他發來題為《文化解釋學初論》的文章。我看了題目,覺得用“初論”可能顯得一般化了些,就決

定改用“引論”。他表示“引論”更為切題。這篇文章刊發在《東南學術》2019年第4期上,被《新華文摘》2019年第21期全文轉載。比起“空間解釋學”,我覺得他對“文化解釋學”的討論更具有把握性和思想力。這個例子說明,“預設”具有相當大的可能性空間。任何一位嚴謹的學者,他的學術思考一定是不停歇的,他的學術觀念和思想理念一定是獨一無二的,只要去除籠罩在本體論存在和終極性價值之上的面紗,對於既有學術理念的“是”或者“否”作出深刻的思考和判斷,那麼他所表達的就是具有思想力的學術表達。所以,我覺得無論是學術期刊的主編還是責任編輯,都應該加強學術“預設”能力的訓練,大膽地合乎學術發展邏輯地向作者“預設”學術論題,這對於學術期刊平台思想力的建設是至關重要的。

## 二、平台的集成能力和主體意識

學術期刊平台是一個大的總的平台,每一個欄目(無論是否具有欄目標題)都是分平台,而每一位編輯也都是小平台。我們不能把這個大的平台窄化,即窄化為是一家地域性的刊物,而一定要有宏大的學術視野,站在國家學術發展的層面和高度上審視學術,審視學術發展的空間。不要輕易地把這個觀念當作什麼“霸氣”,綜合類學術期刊真正的“霸氣”在於平台的集成能力——這是學術期刊的一種“內蘊力”。

西方有兩個流行的哲學命題:“人是理性的動物”<sup>⑧</sup>“知識就是力量”,<sup>⑨</sup>把這兩個觀念結合起來就是:理性的知識力量只能外向性地改造世界,而智慧和理念的力量才能內驅性地成就人生——這是橫在我們心中的生命狀態和文化難題。每一家學術期刊都有人文學術的獨立價值,都有屬於自己的價值依據,有內在於自己的價值重心。我認為,到目前為止,我們這個時代的學術期刊,在人文致思的水平上依然是有所欠缺的。所以,學術期刊編輯除了具有高度的學術智慧,還需要有人文性的學術情懷。“人心皆有詩”,留住心中的那一份詩意——這就是我們在學術期刊裡留下的那一份神聖感和敬意。智慧和情懷的完美結合,才能使得我們真正將所養潤的生命狀態和脈息灌注於學術期刊的運思中,從而成就一名合格的主編或編輯。

黑格爾宣稱,在哲學史的邏輯鏈條中,任何哲學的基本原則都推翻不了,被揚棄的僅僅是它們的絕對性。<sup>⑩</sup>在黑格爾的哲學史空間裡,從東方到西方,從一個哲學家到另一個哲學家,都是環環相扣的,其聯繫之緊密猶如邏輯學裡的概念範疇之間的連接。在黑格爾看來,邏輯規定着歷史的原則,也正是從邏輯的規定而來,歷史才能成其為歷史,才能把諸多哲學家聯接成一個宏大的鏈狀系統。這是黑格爾所規定的一個場域。如果把這個場域搬到學術期刊平台建設上,我覺得每一個學術平台都是一個場域,每一篇優秀的學術論文,在這個平台的場域甚至在理念史上都可能有一席之地;但任何具有原創性水平的論文,任何具有原創性的深度智慧,無論怎樣地有破綻或漏洞,無論怎樣被人駁斥或批判,都不可能一筆勾銷,都可以在這個場域和邏輯鏈條裡找到位置。學術不是理智的遊戲,它是具有學術使命的學者借助運思所達到的心靈深處的蘊蓄。清代的戴震在世時名氣不如提拔了他的紀曉嵐,體系上的博大精深也遠遠趕不上比他更早期的王夫之,然而他直斥宋儒“以理殺人”,僅這四個字,就足以力壓千鈞,讓人產生了顫慄之感,從而將他自己成功地送進了中國理念史。戴震最大的理論貢獻,在於猛烈打破了“天理”和“理”的神聖性、神秘性,後世學者所有圍繞儒家所展開的那些批判,尤其是對“吃人禮教”的定位,幾乎都繞不過它。這就是學術理念的“霸氣”。今天我們只要稍稍梳理一下思想史的精神脈絡,就會發現,戴震的這個原創性學術理念,具有相當的思想強勢。

由此,我想到學術期刊編輯能不能發現到這樣的智慧理念?擺在我們面前的稿子五花八門,但一旦進入學術期刊平台的深度層面,我們就會感到有時候還真是“巧婦難為‘有’米之炊”。“米”都在那裡,怎麼去“炊”它們呢?所有的學術問題也就那麼些根本,那麼些終極,你究竟要下怎樣的功夫,才能在芸芸眾“稿”裡編出深意,輯出新意,編輯出真正合乎由“命”而“道”精神的具有充分學術價值的刊物,從而實現期刊平台真正的學術理念?

這就是學術期刊的使命。質言之,也是學術期刊平台的集成問題。

綜合類學術期刊就是一個集成。刊物辦得如何,首先要看主編對一本刊物的集成能力。綜合類學術期刊已經不像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是一個邏輯嚴密、內涵清晰的概念,它更像是期刊集成,是一個集合體。

綜合類學術期刊是中國特色科研體制的產物,與專業性期刊相比,存在着先天不足、後天乏力的劣勢。目前綜合類學術期刊已經走入“泛綜合化”時代,表現為刊物在成果的推介形式上是文集式的,並且從形式到內容都大同小異,刊物整體性地陷入了“同構”:編輯方針、編輯模式、編輯手段、欄目設置都雷同,甚至探討的社會熱點問題也雷同。在目前的條件下,要改變這一局面顯然是困難的。誰都不否認目前綜合類社科期刊辦得過多過濫,但要減少綜合類學術期刊的數量,增加專業性學術期刊的數量,或者改為某一學科的專業期刊,其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別無選擇,只能跟着走入“泛綜合化”的時代。這時,綜合類學術期刊的主編、編輯就得考慮辦刊思路和刊物定位問題,就得考慮學術期刊平台合理的存在。一句話,必須考慮這個平台的“集成”水平和能力。

這是目前綜合類社科期刊的第一“經典性”難題。

然而,綜合性也並不完全是制約綜合類學術期刊發展的“瓶頸”,從另一方面看,它又有其優勢。在綜合類學術期刊不可能成為專業性學術期刊的情形下,我們不妨改變策略,做“小專業”,即在欄目“集成化”建設上下功夫,以欄目帶動整個刊物。在這樣一個注意力經濟和閱讀碎片化的時代裡,特色與個性肯定是綜合類學術期刊的生命。一本學術期刊如果沒有自己的特色和個性,是難以在期刊的森林中有任何“顯示度”的。事實上,在綜合性學術期刊中,還是有不少期刊堅持自己的特色和個性,從而彰顯了學術生命力和社會影響力。欄目的集成化說到底還是以問題導向為中心,以跨學科研究為基點,以專題策劃為抓手,以個性和特色為追求,推進不同學科的交叉、融合。套用一句時髦的話說:走內涵式發展道路。就是要化劣勢為優勢,從“學科綜合”的辦刊模式向“問題綜合”的“集成化”平台策略轉變。

所謂“問題綜合”,就是要求學術期刊編輯部要有中心意識,或者叫做主體意識,多方調動學術資源和作者資源,形成學術期刊與學術發展、學科建設之間的互動關係。“問題”就是時代的聲音,就是學術和理論創新的生長點。能否在獨特的“編輯思維”作用下發現真正的問題,能否組織和引導問題的討論,推動知識生產和學術創新,無疑是衡量綜合類學術期刊是否作為和盡到應盡的責任的重要標尺。在刊物組稿和編輯方式上,設法擺脫過去的學科編排模式,打破學科“壁壘”,以“問題綜合”為中心,把一些經過充分論證和研究的專題以集束式形式顯示並形成影響,從而形成刊物自身的特色——其實,這個問題在這裡不必贅言。目前,許多綜合類學術期刊在學術取向和欄目建設方面,都考慮到“以問題為中心”的編輯模式,設置了一些具有特色的欄目,在學術組織和學術引導上力求主動融入學術發展的主流,努力彰顯問題意識和學術意識,在一個更高的制高點上把握學術發展的趨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這是值得肯定的。

“以問題為中心”的編輯模式，實際上就是我們一直掛在嘴邊的“問題意識”。“問題”說穿了，就是“發問”“追問”和“拷問”。誰都知道愛因斯坦曾經說過的那句話：“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sup>⑩</sup>的確，一切學術研究都來源於問題，所有的理論創新皆源於發問本身。所以，所謂“問題”就是預期與現實之間的反差引起的學術困惑。有學者把“問題”分為三類：理論與現實的差異、政策與實踐之間的差異、在同類事物比較中的差異。然而，不管有多少種差異，事實上每一項研究都需要從問題出發，理論創新也是從發問方式的變遷開始的。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追問的是：“問題”和“預設”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關係？

“預設”一定是“問題”的前提。一本學術期刊的集成化策略，就在於對於“預設”和“問題”的雙向把握上。一篇論文的問題與學術背景、學術前提的關係如何？資料和結論之間的關係如何？那些被引用的資料，是否可以體現“預設”，回答“問題”？甚至引出來的相反的結論，在經過了考證之後，是否有先入為主的誤讀可能？如此種種，都是編輯要能夠看出來的。

南帆教授寫過一篇文章《哲學與牛肉麵》，講述了兩個教授整個下午專注地討論康德提出的哲學問題。傍晚的時候，他們一起到附近的麵館吃牛肉麵。他們共同承認，牛肉麵相當可口。在飯館裡，他們的有關麵條的粗細、牛肉片質地以及花椒數量的分析很快就結束了。離開麵館之後，兩個教授又開始接續康德的話題，什麼物自體、啟蒙或者二律背反這些深奧的概念，輕而易舉地甩開了牛肉麵的烹飪研究。從這裡，南帆想到什麼呢？他想知道的是，康德的話題和牛肉麵烹飪研究，會不會在宇宙空間的某個交叉路口相遇？兩種知識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隱秘的小徑？這是南帆對於話題的一個“預設”，在這個預設中，究竟有多少個“問題”和可能性潛伏在那裡呢？質言之，在南帆的思想框架裡，“預設”和“問題”將形成什麼樣的關係？

南帆後來寫道：“一種知識與另一種知識的意外結合令人驚喜。據說納米機器人可以清洗人體血管內部的污垢，納米技術與醫學的握手言歡打開了特殊的空間。另一些人居然將互聯網、手機與自行車放在一起考慮，於是產生了共享單車。然而，大部分知識網絡陷入互相割據的狀態，物理實驗室裡的人絲毫不想關心史學正在討論什麼，法律專家與地質學家老死不相往來。我們習慣了，各行各業又有什麼必要像鄰居一樣相互打招呼呢？”<sup>⑪</sup>顯然，南帆的敘述已經把“預設”成功地轉化為“問題”。這只是南帆的一篇隨筆，以小見大，可以肯定，他所具有的成熟的心智和學術功力，無疑足以支撐他的另一些宏大的學術見地。

同樣，學術期刊平台需要如此高超的對於“預設”和“問題”的把握能力，才可能完成平台的集成化。平台的集成能力是刊物的“看家本領”，這裡面的中心問題，就是平台集成的“主體意識”，也就是“主流意識形態”。用黑格爾的比喻來說，就是“廟裡的神”。黑格爾說，“一個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沒有哲學，“就像一座廟，其他方面都裝飾得富麗堂皇，卻沒有至聖的神那樣”。<sup>⑫</sup>今天，我們的“至聖的神”是什麼？就是馬克思主義。這裡不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神”，而是借用黑格爾的比喻，是一種“神聖”和“崇高”，是“主體意識”，是“主流意識形態”。

這實際上是對人文學術品格的一種認識，也是對於人文學術使命的認取。孔子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論語·述而》），“守死善道”（《論語·泰伯》），老子說“為天下渾心”（《老子》四十九章），這都是對於所負學術使命的體認。我們的學術是貼近現實、貼近人生的學問，它是有生命的，涵蓋着“境界”和“命運”這兩個維度，而統領這兩個維度的，必然要受到當代主流意識形態“至聖的神”的指引。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的學說肯定是一種普照的光，是我國理論界乃至這個意識形態領域在認知上最重要的價值取向和價值內核。無論出現怎樣的學術悖論，馬克思主義

所創立的唯物史觀，一定是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最高命題和根本價值。所以，我們才把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看作是“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是馬克思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一個根本性維度。認識到這一點，在我們的學術期刊編輯過程中，才可能對當代主流意識形態和學術期刊平台主體意識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和理解，而不是簡單地把它們庸俗化或面具化，從而墮入一般的工具理性。維特根斯坦認為，人們的任何一種活動都可以說是一種遊戲。遊戲必須依據和遵循一定的規則。沒有規則的遊戲是無法進行的。<sup>⑭</sup>學術期刊平台的集成化，也許也是一種遊戲，但它必須遵循現行的“主流意識形態”，因為它是學術期刊平台的政治生命和主體意識。

### 三、學術論文的“完成度”

自古以來，真正有價值的人文學術都是生命化的。儘管在它的發祥之初富於悲劇性，然而正是如此的悲劇命運，才有了那種濃重的憂患意識。西方學術發端於古希臘哲學，中國的人文學術拓辟於先秦諸子。無論是孔子、老子，還是蘇格拉底、柏拉圖，他們的生命氣象造就了一種高卓而貼近人生的學術品格。孔子的“篤信好學”成為了中國歷代學術發展的一個成就之教，蘇格拉底的“美”、“善”、“大”也提出了至為完美的學術心靈境界的追求。任何一位具有使命意識的學者，他們所篤守的人文學術對於世人“心靈的最大程度的改善”<sup>⑮</sup>的承諾，始終昭示着一種生命化的學術品格——這就是他們所追求的學術風致。具體到一篇論文上，它的完成度就有高低之分，完成度高，意味着論文水平也高，反之，就是還有精進的空間。學術期刊的編輯是平台的“操盤手”，要善於對作者論文的完成度有個明顯的判斷，用現在的時髦話語來說叫做“研判”。

吉林大學孫正聿教授在 1988 年、1994 年和 2001 年分別寫了三篇文章，用的是同一個句式。1988 年的題目是《從兩極到中介——現代哲學的革命》，討論的是現代哲學如何區別於傳統哲學，發生了什麼樣的革命性變革。他說這是一個較勁的題目，就是現代哲學與傳統哲學的較勁。他認為人們的思考開始從兩極、對立走向了一種中介化的思考，我們才能夠深刻地闡釋馬克思所實現的實踐的轉向，以及現代西方哲學所實現的語言轉向。到了 1994 年，他的題目就變成《從體系到問題——當代中國哲學的主流》，涉及到的已經是體系性的問題了。而到了 2001 年，他的題目又變成《從層級到順序——當代中國哲學的趨向》，這就涉及到後形而上學的問題。所謂的後形而上學，就是改變了一種層級性的、終極性的尋求，變成一種實踐性的、順序的選擇和安排。這是作者對於當代哲學思考在時間上的一個完成度。

作為編輯，要能夠從作者對學術問題的完成度上，去判斷一篇論文的思力，這種思力包含着洞察力、概括力和思辨力。當然，作者的思考是在不斷發展的，這裡既有空間的展開，也有時間的延續和推進。比如對於孫正聿，編輯是不太可能從第一篇文章裡就明確意識到作者還能有後面兩篇文章的思考。這個例子提示我們，必須具有作者那樣的對於一個學術問題的完成度思維。對於期刊平台來說，完成度同樣是一種理論思維。恩格斯曾經說過什麼叫哲學？哲學是“建立在通曉思維歷史及其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sup>⑯</sup>

孫正聿於 2012 年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資本論》哲學思想的當代闡釋”，試圖從不同角度闡釋《資本論》的哲學思想。他所面對的問題就是：《資本論》是“運用”還是“構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研究過程中，他發現在通常的理解和闡釋中，都認為“馬克思在這部著作中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從而“創立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由此，《資本論》被認定為“政治經濟學”而不是“哲學”，《資本論》是“運用”而不是“構建”了馬克思主義



哲學。基於如此的觀念，長期以來或者離開《資本論》而闡釋馬克思主義哲學，或者把研究《資本論》的哲學思想限定為《資本論》如何“運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其直接後果是影響了對《資本論》哲學思想的闡釋。與這種把馬克思主義哲學“運用”於《資本論》的思路不同，孫正聿試圖探討如何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資本論》的“互釋”中，既闡釋《資本論》的哲學思想，又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經過研究，他提出了四個理論觀念：(1)《資本論》是關於人類解放的“新世界觀”；(2)《資本論》是“關於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3)《資本論》是“政治經濟學批判”；(4)《資本論》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和“文明的活的靈魂”。他得出的結論就是：不是《資本論》“運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而是，《資本論》“構建”了以“改變世界”的“世界觀”為“活的靈魂”的馬克思主義。

這就是孫正聿對於《資本論》哲學闡釋的“完成度”。事實上，如同恩格斯說的哲學就是“建立在通曉思維歷史及其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sup>①</sup>對於《資本論》的哲學闡釋的確具有相當大的學術空間。孫正聿對於《資本論》的哲學闡釋的學術“完成度”就表現在：在現代哲學意義上對《資本論》的闡釋，是作為“世界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是構成馬克思主義揭露“物和物的關係”掩蓋下的“人和人的關係”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同時還是構成馬克思主義的批判“不合理的現實”和爭取人類解放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這三個方面的理論支撐，使得孫正聿圓滿地完成了對“《資本論》哲學思想的當代闡釋”。

孫正聿 2011 年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的《“現實的歷史”：〈資本論〉的存在論》一文，可以說是對《資本論》哲學思想的一個深入探索。他認為，《資本論》通過對商品、貨幣、資本、剩餘價值等經濟範疇和資本運動邏輯的考察與分析，深刻揭示了“物與物的關係”掩蓋下的“人與人的關係”，從而實現了“對現實的描述”與破解“存在的秘密”的統一。馬克思與他所批評的“哲學家們”的原則分歧在於：後者總是把“存在”視為某種超歷史或非歷史的存在，因而以追究“世界何以可能”而“解釋世界”；馬克思則把“存在”視為“現實的歷史”的存在，因而以探索“解放何以可能”而“改變世界”。正是“改變世界”的理論自覺，馬克思終生致力於研究“現實的歷史”，而對“現實的歷史”的研究，則形成了馬克思為之付出畢生心血的《資本論》，《資本論》是關於“現實的歷史”的存在論。這篇論文，從當代性上對《資本論》的哲學思想作了一次深刻的闡釋，達到了孫正聿多年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新的“完成度”。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黃宗智教授在談到自己的學術經歷時提到：“我清楚地認識到學術研究也是一個自我認識和理解的過程，其中的關鍵也許是個人心裡最關心的問題。”<sup>②</sup>黃宗智的啟蒙訓練是側重經驗證據的歷史學，那個時候是不太關注理論的。後來所發生的那些語言和學術張力的爭論，促使他在寫完博士論文並將其修改補充成為第一本專著起，開始系統地研讀理論，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理論。之所以同時關心這兩種理論，除了作為學術問題外，還有一種更深層的感情因素：在他的心目中，父親——作為一位早期（1911 年）庚子賠款留學生、哥倫比亞大學 1918 年的經濟學博士，代表的是美國，是資本主義和科學主義，而他的母親作為一位耕讀世家的閩秀，卻不懂英文，代表的是傳統中國文化和農村。黃宗智的博士論文《儒家的自由主義者：梁啟超與現代中國》是在導師蕭公權教授指導以及父親的影響下撰寫的，論文除了盡可能精確地梳理梁啟超的思想之外，更是試圖認同蕭公權教授和父親都十分推崇的西方古典自由主義，包括經濟和政治思想。論文試圖在梁啟超的思想和西方古典自由主義之間劃上等號，並且發現人生和學術的最終價值。但是對他來說，無論是認識上還是感情上，這篇博士論文的 Research 和寫作都遠遠沒有解決他心裡最關心的矛盾和問題。他認為博士論文和之後在其基礎上寫成的專著，在他內心所



引發的其實只是對學術的一種負面反應：缺乏興奮感。他因此一度陷入某種不在乎的心態，把博士論文的修改工程一直延宕到為了保留自己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的教學職位（終身權考核），這才迫不得已地“完成”了這本專著。其時，他的論文沒有達到他理想中的“完成度”，也就是說，他還沒有找到學術問題的理想的突破口。

黃宗智所設想的是，找到最翔實的歷史資料，通過研究來解答古典以及新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究竟孰是孰非的問題：哪一方面將更契合中國的實際，對理解中國實際更有幫助？為此，他花了兩年的時間，瀏覽了各種各樣的歷史材料，最終發現“滿鐵”（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大量中國農村調查資料，才是自己所需要的最翔實的材料，由此決定完全投入其中，通過嚴謹的經驗研究來解決內心的深層問題。當然，選擇這樣的題目和材料，已經脫離了從他父親和導師那裡承繼的對於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的偏重。的確，正是馬克思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理論，以及對於父母親的感情因素，這兩種傾向不斷衝擊而產生的張力，才決定了他的學術研究的基本問題和“完成度”。這個給定了的實際，乃是中西方在理智和情感兩個層面上並存的實際，這也是中國近現代歷史所給定的基本實際，無論簡單拒絕哪一方面都不可能達到內心的平衡和穩定。

從孫正聿到黃宗智，我們看到了他們對於哲學、對於古典和自由主義問題研究的一個完美的“完成度”。他們有他們的學術規則和問題意識，有屬於他們自己的學術空間。對於“問題”的“預設”，實現了他們的學術自由，捍衛了學術尊嚴，創造着這個時代寶貴的精神財富。

在文學界，有評論家呼籲：別把小說寫得太像小說，因為“太像”就顯得“匠氣”太重，就會把小說原本的質感給破壞了，反而使得小說的合理性不穩固。學術論文就不然，它恰恰需要“匠心獨運”，需要學術的“匠氣”。“匠氣”到家，論文的“完成度”才能真正做到厚重、深刻和優雅。“完成度”是對編輯學術水準的一種考量，一篇優秀的學術論文的“完成度”就體現在理論創造上。有學者指出：沒有理論，你的研究將一無所有。從學理性意義上說，理論給出的是一般性的可以跨越時空的解釋，但不同的理論有不同的解釋原則和解釋框架，任何一個好的理論都是可以證偽的。只要一個理論能解釋多數的事實，就是屬於具有學理性的好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哲學革命的意義就在於改變了傳統的世界觀，並且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原則和解釋框架。恩格斯在評價《資本論》時說：“一門學科提出的每一種新的見解，都包含着這門學科的術語革命”，<sup>19</sup>這種術語革命將直接構成一個新的概念框架和解釋框架。《資本論》就是區別於原有的經濟學概念內涵，從而構成了一個新的解釋框架。儘管，當時有人對《資本論》提出各種各樣的批評，但它作為人類思想庫中的瑰寶、博大精深的百科全書和一個完整的藝術品，是馬克思主義最厚重的著作，一直矗立於世界學術理論之林。這就啟示我們，當代學者學術骨子裡的神聖感和敬意，就是把一部學術著作、一篇學術論文當作一個完整的藝術品，從而體現出學術創造的完美的“完成度”。

追求學術論文解釋原則和解釋框架的完美的完成度，是學者的使命，是一位學者作為自在的人的使命。作為社會的人的使命最終是自由，這就是費希特始終在歷史的意義和個體生存的意義維度上思考的學者的使命。啟蒙哲學家賦予了世俗歷史以神聖的道義，同時在世俗歷史框架內建構個體生存的意義。費希特正是遵循着這個理路，去討論學者的使命的。學術的歷史是由學者創造的，它集中體現為至善實現和完美“完成度”的過程，人的自覺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有所擔當，正如費希特所說的：“我是那偉大鏈條中的一個必要環節，這個鏈條從第一個人的發展開始，到達對他的現實存在的充分意識，以至最後進入永恒狀態；所有歷來偉大、英明和高尚的人們，那些在世界史記述中我們看到其名字的人類恩人，那許許多多留下了功績而沒有留下名字的人們，他們都為我工

作過,我享受着他們的勞動成果,我在他們居住過的大地上,踏着他們傳播天福的足跡。邁步向前——當我們對自己這樣說時,就會提高對我們的尊嚴和我們的力量的感受。”<sup>②</sup>

這是學者“內心的召喚”。阿基米德在羅馬士兵衝入家門時仍然埋頭於他的幾何學研究,並且大呼:“別碰我的圓!”至死而不悔。胡塞爾在接到弗萊堡大學的禁令,無法再行使教師之職時,仍然繼續其哲學思考,在禁令的背面寫下自己的研究手稿。他們“冷靜而自信,就好像科學研究的嚴肅性不能為世界上任何事物所干擾”(勒維特語)。<sup>③</sup>由此可見,真正的學者的“內心的召喚”往往要比那些殘酷的世事的外在壓迫更強烈,也更具有學術的“職志”和“使命”。

學術期刊編輯也是學者,也需要“內心的召喚”。我們對於使命的擔當,就是對於學術期刊平台“完成度”的一種提升,也是對於理論境界的一種提升。

#### 四、餘論:如何在學術期刊界生存

學術期刊界是個原始森林,沒進入之前覺得有點恐怖,但又覺得有些好奇。前些年有一本很紅的書《我的成功可以複製》,這其實是本吊胃口的書。如果成功真能複製的話,作者是註定不敢告訴你是怎樣複製的。所以說,“我的成功可以複製”絕對是虛假的。每個人的成功都有每個人的運行規則,不可能是照搬照套出來的。落實到學術期刊,每一家期刊也都有自己的生存策略和路數,不可能完全生搬硬套,東施效顰顯然是不可取的。學術期刊就是為創造和承傳真知的學者提供一個平台,這個平台一定是具有個性的,只能是屬於我們自己的獨立平台和獨立空間。

為什麼在學術期刊界生存,主編和編輯要有生存意識?我們深深感到當學術期刊編輯的種種壓力,尤其是現在所面臨的壓力似乎更大。當編輯很好,然而當編輯也很難。在學術期刊界的生存只是表面上的生存,它不等於真正的生存。面對各類評價系統的種種壓力,面對期刊生存的發展空間,有人說期刊主編是“活法單一,死法很多”。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的確有過許多精神困惑。怎樣去破解這種精神困惑呢?除了對於學術期刊平台使命的堅守之外,依然得依靠我們的“衣食父母”——作者。每一位作者都具有“個別的自我意識”,<sup>④</sup>然而這個“個別的自我意識”的現實化,則體現在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的“個人自主活動”<sup>⑤</sup>或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sup>⑥</sup>上。作者的個體自由是馬克思最初的思想生長點,也是馬克思所眷注的個人思想維度上的價值樞紐。雖然作者是奔着學術期刊平台而來,但是尊重作者的個體創造,尊重作者的獨立性和個性,仍然是學術期刊主編或編輯所要秉持的任務:着意於作者的個人權利。在這個時候,我們考慮學術期刊的生存空間,考慮編輯的生存意識,首先就要屬意作者的“每個人的自由”或“自由個性”。作者的“個人自主活動”,對於學術期刊的訴求其實就是:“這種情況……提出了這樣的任務:確立個人對偶然性和關係的統治,以之代替關係和偶然性對個人的統治”。<sup>⑦</sup>質言之,維護作者的自由個性,就是維護學術生產和理論創新的根本立場。

學術期刊編輯是個“修行”,光有熱愛和熱情是不夠的,需要有由淺入深、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學術訓練和思維訓練。這個過程一定是艱辛的。黃克劍教授認為:馬克思的思想當然有一個從“不成熟”到“成熟”的過程,但這過程決不是“主流之見”所描繪的那樣——馬克思起先是黑格爾的信徒,後來受費爾巴哈影響成為費氏式的人本主義者,再後來與這種人本主義“決裂”而成熟為馬克思主義者。在黃克劍看來,“猶如一棵樹從種子萌芽到開花結果是它的由‘不成熟’趨於‘成熟’,一位獨樹一幟的思想家即使在他‘不成熟’時也已經有了指向‘成熟’的那種精神性狀。”<sup>⑧</sup>馬克思從“不成熟”到“成熟”,由其思想生長點開始貫穿他的思想全過程的,就是他對人的“自由發

展”、“自由個性”何以可能的探索,這與他提出的“個人自主活動”是一理相通、一脈相承的,從這裡我們才能進入馬克思的思想王國。這是一位真正獨樹一幟的思想家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具有的學術品格的“成熟”。相比之下,我們的確是渺小和微不足道了很多。

我大學畢業後到一家學術刊物當編輯,當時在《中國社會科學》讀到李澤厚先生的《孔子再評價》,讀得懵裡懵懂的。直到幾年後我才慢慢把這篇論文讀懂了,因為我畢竟經歷了幾年的學術期刊編輯訓練,更多地了解到學術界的一些動向。那時才意識到,李澤厚這篇文章為中國思想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開端,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確立了以西方思想或價值觀念評論中國傳統思想的方式。確切地說,這種方式就是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尋找或發現西方思想或價值觀念。不可否認,無論是當時過於喧囂的啟蒙或文化啟蒙,還是後來有些“炙手”的“國學熱”,都與此有關。

1987年,我通過朋友的關係到北京找到了李澤厚,跟他面談了兩個多小時。那天一進門,我看到他的廳堂裡懸掛的馮友蘭書寫的對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剛日讀史柔日讀經”,覺得好奇,於是就從為什麼要顛覆張之洞先生對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闡述談起,話題漸漸展開了。一次時間並不長的見面,只是就那時的理論話題作了個訪談,沒有涉及他的太多的治學經歷或什麼“傳奇”,然而與這樣的一位學術大家面對面,對於當時還年輕的我,的確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學術訓練。李澤厚在中國學術界的精神價值,在於守住他的學術生命的重心,為中國當代哲學和實踐美學提出了深刻的學術命意。這是屬於他的學術審美之維。

不可否認,當今學術期刊的生存壓力肯定比20世紀80~90年代要大得多。但不管是活法多還是死法多,都是學術的使命和人文致思座標在牽引着我們。東晉時期的葛洪說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sup>①</sup>由“生”而趨於“長生”,這或許就是我們的終極追求,也是我們今人接樅古人重“生”的一種心靈祈向。學術期刊平台就是我們的生存之地,它們是生生不息的。看管好我們的陣地平台,別無他路,也別無選擇,只能讓我們繼續踏入“達本明性之道”。<sup>②</sup>

那麼,如何去求生存呢?我認為只有不重複、只有創新才是唯一的出路。什麼是“不重複”?就是在學術觀念和理念、在學術論證進路、在學術話題的起點和落腳點,以及在學術問題的取向上,都能夠表現出屬於你自己的“差異性”。馬克思當年對蒲魯東有很多批評,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批判蒲魯東不斷重複。馬克思把蒲魯東稱為“學術暴發戶”,說蒲魯東極其無聊地胡扯“科學”,錯誤地以“科學”自誇,“甚至把他僅僅重複舊東西的地方也看做獨立的發現;他所說的東西,對他自己說來都是新東西而且是被他當做新東西看待的”。<sup>③</sup>當我們把當代的個別“研究者”與蒲魯東相比較,就會發現這些“研究者”竟然比蒲魯東還要遜色。不管怎麼說,蒲魯東重複的是他自己,而當代這些“研究者”重複的卻是另外的作者,他們無端地給學術期刊帶來了許多困難和“死結”:誰都不能說它錯,因為它所複製的東西原本就是正確的;誰也不能說它沒有意義或沒有思想,因為它所複製的文本就是有意義和有思想的。也許,“不重複”和創新意識這個話題已經談論得太多了,但是對於學術期刊平台的生存來說,它依然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①② 費希特:《論學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梁志學、沈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46頁;第33頁。

②③⑤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60年,第80頁;第80頁;第515頁。

③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7頁。

- ④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孫周興譯，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第196頁。
- ⑤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第288頁。
- ⑥《胡適文集》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31頁。
- ⑦賀東航、孔繁斌：《公共政策執行的中國經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
- ⑧轉引自加達默爾：《哲學解釋學》，夏鎮平、宋建平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年，第59頁。
- ⑨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西方哲學原著選讀》，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383頁。
- ⑩劉清平：《何謂思想家？——關於思想史的若干反思》，長春：《關東學刊》，2018年第2期。
- ⑪艾·愛因斯坦、利·英費爾德：《物理學的進化》，周肇威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62年，第66頁。
- ⑫南帆：《哲學與牛肉麵》，廣州：《書城》，2018年第1期。
- ⑬黑格爾：《邏輯學》上冊，楊一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6年，第2頁。
- ⑭轉引自孫正聿：《哲學通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3頁。
- ⑮北京大學哲學系編譯：《古希臘羅馬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149頁。
- ⑯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28頁。
- ⑱黃宗智：《問題意識與學術研究：五十年的回顧》，廣州：《開放時代》，2015年第6期。
- ⑲馬克思《資本論》，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4頁。
- ⑳轉引自倪梁康：《會意集》，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年，第44頁。
- ㉑《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頁。
- ㉒《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89頁。
- ㉓孫秀昌：《探尋虛靈的真實——黃克劍教授訪談錄》，北京：《文藝研究》，2017年第6期。
- ㉔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勤求》，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52頁。
- ㉕《道藏》第二冊，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1988年，第915頁。
- 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9頁。

作者簡介：楊健民，福建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東南學術》執行總編輯、研究員。福州 350001

[責任編輯 劉澤生]